

再版

鄧小平開放時代

許
行著

A8
X9

再
版

許行評論集之四

鄧小平開放時代

許 行著

開拓出版社出版

鄧小平開放時代

作者：許 行

出版者：開拓出版社

九龍中央郵局郵政信箱72910號

排 字：鄧氏兄弟資料研究出版公司

香港灣仔莊士頓道28-34號莊士敦大樓七樓C室

承 印：藝城印刷公司

香港柴灣利眾街40號富誠工業大廈16樓A4

1987年10月初版

· 版權所有 ·

1988年4月再版

目 錄

計劃與市場

- 7 《七五計劃建議》剖析（一九八五年十月）
- 16 初論七五計劃（一九八六年四月）
- 27 從六五計劃到七五計劃（一九八六年四月）
- 40 國際專家替中國經濟診脈（一九八六年二月）
- 52 外商對華投資冷感的癥結（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 60 市場經濟在中國變了形（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 68 農村商品經濟發展與溫州模式（一九八六年七月）
- 79 個體戶發財後的徬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 91 元老派得勢與中國經濟（一九八七年四月）
- 黨權與民權
- 103 胡耀邦訪歐時透露內情（一九八六年六月）
- 116 胡耀邦的「兩種矛盾論」質疑（一九八六年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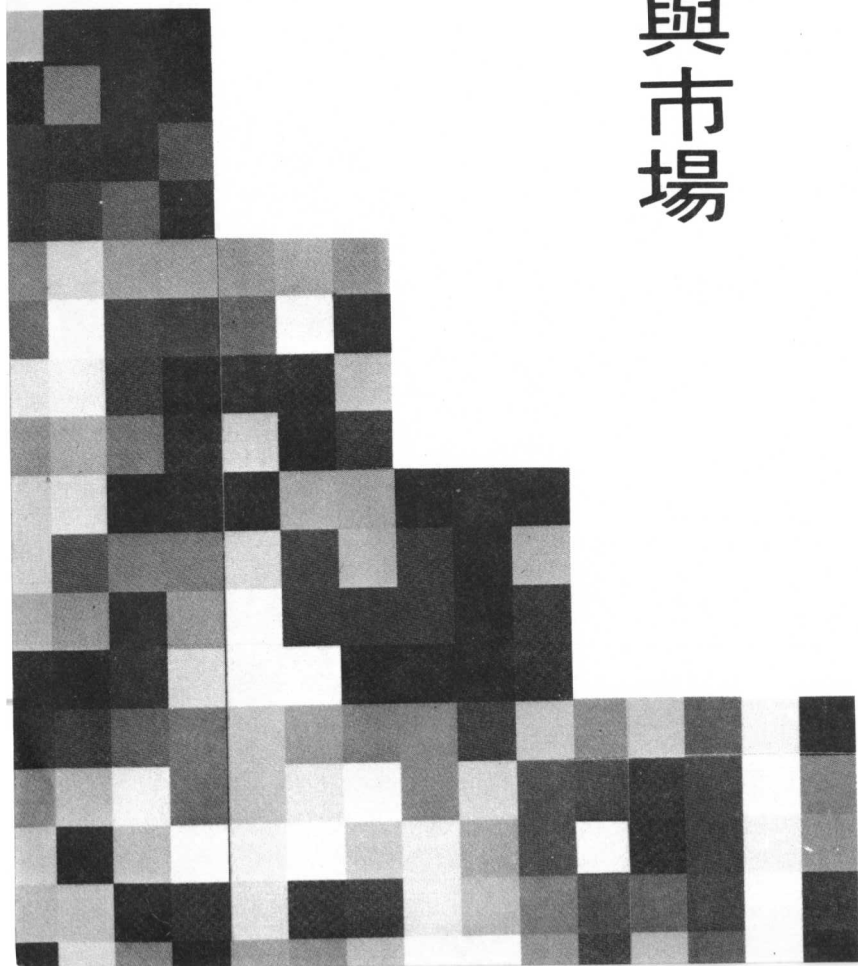
- 121 黨權論與民權論之爭（一九八六年八月）
- 130 黨領導與思想開放（一九八六年九月）
- 138 老人政治在精神文明決議上的烙印（一九八六年十月）
- 146 精神文明決議不是妥協的產物（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 153 改革者中箭落馬（一九八六年六月）
- 156 改革改變了中國青年（一九八六年十月）
- 166 四五運動十年後的回顧（一九八六年四月）
- 172 附：中國民刊的崛起和掙扎圖存（一九八〇年十月）
- 新思潮的起伏
- 187 中國「文藝復興」初露曙光（一九八六年六月）
- 200 中西文化交融的新氣息（一九八六年五月）
- 212 悄悄湧現的思想變革（一九八六年九月）
- 220 王若水批「文藝為政治服務」口號（一九八二年五月）
- 226 象徵主義的奇花——《車站》（一九八四年四月）
- 234 劉賓雁鞭毛激怒南海（一九八五年九月）
- 239 話劇《WM》引起風波（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 244 抽象藝術再次被禁（一九八五年六月）
- 250 命運多舛的抽象畫家馬德升（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 253 今天詩派和星星畫派（一九八五年五月）
- 263 溫元凱的改革引起爭論（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 273 嚴家其夫婦與政治尋根（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 280 李正天鞭打民族心理（一九八七年二月）
- 286 中國的薩哈羅夫——方勵之（一九八七年五月）
- 胡耀邦倒台前後
- 293 學生運動震撼中國（一九八七年一月）
- 303 胡耀邦倒台的台前幕後（一九八七年二月）
- 310 共產黨開除「中國良心」（一九八七年二月）
- 320 保守勢力沉渣泛起（一九八七年四月）
- 328 反自由化受到壓力和抵制（一九八七年五月）
- 337 保守官僚對付學生的殺手鐮（一九八七年六月）
- 344 十三大之前形勢（一九八七年七月）

- 350 中共需要西門豹（一九八七年九月）
- 356 應給西藏高度自治（一九八七年十月）
- 蘇聯·菲律賓·南韓
- 367 蘇聯的戈爾巴喬夫改革（一九八七年三月）
- 376 俄國十月革命的教訓（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 387 菲律賓革命前夕（一九八六年二月）
- 402 菲律賓震撼世界的十日（一九八六年三月）
- 414 菲律賓賓和平革命的啓示（一九八六年三月）
- 421 科拉桑再一次在選舉中大勝（一九八七年三月）
- 430 南韓局勢的啓示（一九八七年七月）

.5. 鄧小平開放時代

計劃與市場



《七五計劃建議》剖析（一九八五年十月）

五年計劃的經歷

中共在建國之後，經濟上抄襲蘇聯模式，自然也就要抄襲蘇聯的計劃經濟辦法，每五年便制訂一個五年計劃。第一個五年計劃由五三年起至五七年止。第二個五年計劃原由五八年起至六二年止的，那時候，剛巧毛澤東頭腦發燒，搞了兩年大躍進，宣佈第二個五年計劃已於兩年之內提前超額完成。事實上，經過大躍進之後，經濟一團糟，由五九年起至六一年連續三年鬧飢荒，周恩來等知道實情，當然不敢再於六〇年開始搞第三個五年計劃，結果推搪說，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後三年還需要一個「補充計劃」，稱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期。這麼一拖，第三個五年計劃拖到六六年至七〇年。可是第三個五年計劃正好碰上文化革命，天下大亂，毛澤東那有心思搞計劃經濟，還是周恩來好歹在一旁裝模作樣，說七一年至七五年是第四個五年計劃期。後來就順着這個次序下去，七六年至八〇年是第五個五年計劃，八一至八五年是第六個五年計劃（簡稱「六五」計劃）。今年（八五年）是「六五」計劃的最後一年，明年（八六年）起便要開始「七五」計劃了。

趙紫陽、胡耀邦彼此謙讓

現在的中共當權者，對經濟計劃比較重視，所以在最近召開的九月代表會議上將「七五」計劃問題列為兩大議程之一。

依照憲法規定，編製國家的經濟計劃，其權限屬於國務院，但中共的體制是黨領導一切，所以黨對國務院制訂「七五」計劃必須有一番指示。不過現在的局面說指示似乎顯得太過居高臨下，於是採用了一種比較客氣的說法，稱為建議。這就是九月代表會議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

趙紫陽在代表會議上說：「這個文件是在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主持下，經過一年多反覆醞釀、討論制定出來的。」他很客氣地將中央書記處擺在前列。但是胡耀邦也很客氣，他說：「關於制定『七五』計劃的建議，醞釀準備已經很久了。起草工作是由紫陽同志主持的。政治局、書記處討論過多次。其間在七月份，還曾經召集有各部門、各地方，若干大廠礦負責人和一些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共約二百人參加的會議，徵求意見。現在經四中全會原則通過，提請代表會議審議。」

趙紫陽說這個《建議》已經反覆醞釀了一年多，那末它與胡啓立主持草擬，於八四年十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在時間上遲不了多少。但是我讀了《建議》全文之後，有這麼一種印象：整個《建議》是貫穿着陳雲的調整精神與《決定》的改革精神，由兩者揉合而成的。在經濟發展進度方面，以陳雲精神為主，在經濟改革方面，以《決定》精神為主。

中共搞經濟，有一個規則，即：始終在「放」與「收」之間搖擺。凡是「放」的時候，總會有這樣或那樣的「放」過頭，於是陳雲的調整精神便在放過頭的時候起了作用，成為「正確」的了。

「六五」計劃成果的檢討

整個《建議》洋洋灑灑約二萬四千字，全文分為七十條，寫得相當全面，其中重心可以分為兩部份，一部份談「七五」期間的總戰略任務，另一部份是談「七五」的改革任務。

《建議》給「七五」的總戰略任務提出一個「奮鬥目標」，就是「使一九九〇年的工農業總產值和國民生產總值比一九八〇年翻一番或者更多一些」，由此使人民的消費由溫飽型逐步向小康型渡過。

爲了達到這個目標，《建議》先檢討了「六五」計劃執行成果，它將成果分爲好的一面和尙有缺點的一面。

好的一面，歸結爲：①農業生產從八一年起每年平均增長百分之十。現在糧食已可自給，棉花自給有餘。②能源方面，近兩三年原油和煤的平均年增長率爲百分之八以上，發電量則避而不提數字。③輕工業近五年來平均年增長百分之十以上。④財政收入八〇年繼續下降，八二年起上升，達到收支基本平衡，八五年預計將超過一千七百億。（註）⑤人民生活方面，五年來職工平均工資增百分之二十以上，農民平均收入增百分之八十。

缺點的一面是：經濟發展的物質技術條件還較薄弱；農業基礎還比較脆弱，部份地區農民的溫飽問題還未解決；能源、交通、通信、原材料還相當緊張；智力開發還不夠；經濟效益不高，生產技術進步慢，經營管理水平低，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不合理；而且特別是：「八四年第四季度以來，工業增長速度過快，固定資產投資規模、信貸資金和消費基金增長過猛，部份商品價格上漲過多，國家外匯儲備下降，經濟生活中出現了某些的不穩定因素。」

上面所述「八四年第四季度以來」所發生的毛病，都是從改革過程中所產生的新問題，保守派就是抓住這些問題向改革派進攻。現在雙方都同意降低工業發展速度，減少基建投資，收緊信貸資金和消費基金。由於這麼一收，許多同中國做生意的人都受到影響，香港有些商人更是首當其衝，因為中國外匯收緊，入口要許可證的範圍擴大，許多原已做成或將要做成的生意，祇好擱淺。而在國內，各省都在削減基建和削減進口設備，已投建的又要設法下馬，農村的情形頗為緊張，好些信用社因為上峯收緊銀根，連農民的存款也支付不了，多處發生擠兌現象，使得農民有錢都往家裏收藏，高利貸由此復活。

四平八穩與「新重農學派」

鑑於「八四年第四季度以來」所產生的問題，中共在這次「七五」《建議》中提出四點「指導原則」，這些原則是：①改革必須與經濟建設相適應；②社會的總供求必須基本平衡，積累和消費必須保持恰當比例；③「七五」期間以提高經濟效益和產品質量為主；④在推進物質文明的同時，必須堅持大力加強精神文明建設。

爲了貫徹上述四點指導原則，《建議》主張「七五」期間的經濟增長率放緩，即：國民生產總值年增百分之七以上，工業總產值年增百分之七，農業總產值年增百分之六；又主張「七五」計劃頭兩年的固定資產投資不增，維持八五年的原有水平。此外，就是加強思想控制。

從這些角度來看，「七五」計劃的總趨勢是傾向於穩健和保守的，它正符合陳雲的精神。陳雲的經濟思想的一個重要信條是：「經濟的平衡發展是最快的發展」，因此他追求財政收支平衡、積累與

消費平衡，不希望外貿發生逆差。這是一種四平八穩的思想，它是從農業社會中衍生的，與現代社會企業家的開拓精神頗有距離。

那種從農業社會反映出來的四平八穩精神，也同樣注定陳雲是一位新的「重農學派」。他在九月黨代會上的講話特別強調要抓農業生產，就是一個例子。他對農民中滋長棄農從工從商思想、流行「無工不富」觀念，深感隱憂，因而喊出「無農不穩」、「無糧則亂」的口號。

這種「新重農學派」思想，在「七五」《建議》裏也有所反映。《建議》對未來的經濟建設佈局，提出六條方針，其中第一條方針就是抓緊農業發展，主張「切不可絲毫忽視糧食生產」。

發展經濟的六條方針

整個「七五」計劃的經濟建設，依照《建議》的指示，主要就是這六條方針。它們是：

第一條方針，重視農業發展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戰略地位。而農業發展中，以糧食為主，在這個前提下，同時加速林業、畜牧、水產、養殖的發展。並且將發展縣鎮企業作為振興中國農村的必由之路，而縣鎮企業中以發展食品工業為重點。

第二條方針，擴大消費品生產，發展民用建築業。這一條是適應人民消費多樣化而提的。其中發展民用建築業，更是為適應人民對居屋的急切需求而提的。《建議》主張積極推行城鎮住宅商品化，這是三十多年來初步想到有效解決民居問題的一項重要措施。

第三條方針，集中財力發展能源、交通、通信和原材料工業。能源、交通、通信、原材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沒有電力、運輸不便、電話不通、原材料缺乏，什麼經濟發展都無從談起。近

幾年來，中共是看到這個問題的重心的，祇是力量不集中，進展速度甚緩。現在再次重視這些方面發展，當然是很必要的。

第四條方針，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第三產業是區別於工業農業之外的服務行業。它不僅有關於人民生活的服務，也有關於企業以及對整個經濟發展的服務。過去中共第三產業觀念淡薄，近年來才注意到它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第五條方針，加強現有企業技術改造。這一條是與「七五」計劃期間限制固定資產投資過大相應的。限制固定資產投資，等於限制進口新設備和不隨便設新廠，因此祇好在舊有企業基礎上加以技術改進了。在香港，企業技術的改進，基本上是淘汰舊的，添置新的。以整套新的去替代整套舊的，這種辦法在經濟效益上往往勝過對舊設備的修補和改良。中國大概是出於外匯短缺的考慮。但是在個問題上，也顯示出農業社會動儉精神與企業家開拓精神之間的差別。

第六條方針，正確處理我國東部、中部、西部三大經濟地帶的關係。有個時期，胡耀邦和趙紫陽都跑到新疆和蘭州視察，提倡發展大西北。「七五」《建議》這一條方針就是要擺正東部、中部和西部的關係，它主張東部以發展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和高檔消費品工業為主，同時開拓國際市場，「外引內聯」，造成對外和對內兩個扇形輻射網，中部以發展電力、煤炭、石油、礦產、建材為主。西部主要發展林牧業，發展交通運輸。這樣的佈局，基本上沒錯，但它屬於四平八穩一類，並無特別創見。

向新的經濟體制過渡

《建議》體現改革精神的是在後一部份，即從第四十八條起到第五十七條止。

《建議》在幾個地方提到「新的經濟體制」，這種稱呼，其目的顯然是拿它來與舊的斯大林式或毛澤東式的體制相區別。《建議》認為要建立「新型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必須抓三個方面：①加強中大型國有企業的活力；②發展並完善市場體制；③國家對企業管理由直接控制改為間接控制，並在調節經濟運行方面改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以代替行政干涉。

大中型國有企業沒有活力，對中共始終是一個難於解開的死結。目前他們所能想到和做到的，也祇是「簡政放權」之類。《建議》表示決心在「七五」期間，將中央或省所屬的企業經營管理「真正放給企業」、「中央各部和省、自治區以承包或租賃方式轉為集體經營或個體經營」。

至於發展市場，《建議》主張今後必須打破條條塊塊的分割封鎖，除了擴大消費品市場之外，將再擴大生產資料市場，發展資金市場和技術市場，並同時促進勞動力的合理流動（他們不敢直說建立勞動力市場）。爲了適應市場的擴大，他們準備進一步放開價格，除極少數重要商品仍由國家定價外，一般商品價格都要逐步放開，而且還要逐步放開生產資料的國家統一定價範圍，放開第三產業價格，剩下來的，祇有少數重要商品和公用事業以及勞務仍實行計劃價格，其他都實行自由價格和浮動價格。

將來國家對經濟運行，主要靠稅務、金融去調節。在稅務方面，以後要盡量分清中央稅和地方稅；地方財政支出自主；國家預算內投資主要用於基礎設施和非盈利事業，盈利性企業和事業單位的投資歸各個單位自理。在金融方面，以後人民銀行作爲中央銀行的權力很大，它要通過各種孔道去控制貨幣供應量和貸款總規模。全國一切金融機構都得服從人民銀行的領導和管理。人民銀行可以對它們

直接進行監督和稽核，而且在必要時有權採取強制性手段。而所有專業銀行或金融機構，今後對貸款都要承擔責任和風險。

經過上述的改革，國家管理經濟的職能也跟着起了變化。它將放棄微觀的管理而側重於宏觀的控制。那些屬於綜合性的經濟管理部門，將要加強決策的科學水平和宏觀控制的調節能力，那些屬於監督性的經濟管理部門，將要加強審計、統計、工商行政管理等的 ability，並加強經濟立法和司法職能，而地方政府，將要在運用經濟槓桿的權限上，也將會有適當的擴大。

對於上述這些改革，經過這次九月黨代會之後，在黨內似乎應該成爲定論，至於改革的進行速度，就要視實際情況而定，當然在推行改革的過程之中，可能還會出現新的問題和新的阻力，但是，如果最後都依着《建議》的步驟進行，那末中國將會進入一個新時期，這個新時期的主要特徵，就是在共產黨統治的社會裏，引進了資本主義的經營模式和管理模式。這樣一種制度，實質上就是社會主義發生資本主義異化。過去，西方有些學者稱南斯拉夫爲「市場社會主義」，中國未來的道路也是朝着所謂「市場社會主義」的方向走。所不同的祇是，南斯拉夫在企業管理上實行「工人自治制」，中國將不會出現「工人自治制」。鄧小平等所倡議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這麼一種異化了的社會主義。

(註) 《建議》中這樣寫道：「預計一九八五年國家財政收入將超過一千七百億元，加上地方、部門和企業擁有的預算外資金，總共將達到三千億元以上，比一九八〇年增長將近一倍。」這裏將預算外資金湊在一起去與八〇年作比較，似乎不大合理。